

社会主义 财政问题研究

北京财政学会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财政问题研究

北京财政学会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责任编辑：贾宝臻
封面设计：习亚薇
版式设计：代小卫

社会主义财政问题研究

北京财政学会 编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14.25印张 353000字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4000册

统一书号：4312·239 定价：3.60元

ISBN 7—5058—0058—2/F·52

说 明

本书是北京财政学会从1981年成立以来至1986年，围绕着我国各个时期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财政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对财政、税收等经济杠杆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评价。这次出版前，按文章内容，进行了综合分类，使之更臻于条理化、系统化。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建设 中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 认真贯彻党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许毅 (3)
经济发展要有全局观念 左春台 (23)
社会总产品分配和国家重点建设投资 赵春新 (32)
充分认识提高教育投资速度和效益的紧迫性 高学增 (46)
经济杠杆与宏观经济控制 何振一 (54)
治理污染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 孙同越 (65)
控制国民收入积累率 裴元秀 (69)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重视经济效果 董其鸣 (81)
折旧基金用于生产规模扩大的探讨 王琪 (86)
关于北京市普教经费的分配和使用 高林 (99)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开创财政工作的新局面

- 深入调查研究，推动财政体制改革 常自超 (109)
正确处理财政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常自超 (113)
我国财力分配的矛盾及国家财政的调节作用 张胜宏 (121)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初探 王宝森 (145)
北京市财政问题的初步探讨 高学增 (154)
城市财政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麦履康 (167)
谈谈乡财政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朱志刚 (176)

- 乡财政体制的性质及其资金运用 尤大韶 (185)
北京市财政管理体制概况 孙振刚 (192)
北京市财政系统干部教育工作现状与未来 马兰弟 (200)

发挥财政经济杠杆作用 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 论经济结构和财政 赵春新 (209)
社会主义财政的属性 李晓村 (225)
所有制关系与财政改革 何振一 (232)
商品性质是财政干预经济的前提 贾广祺 (243)
财政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安体富 (261)
预算外资金问题 孙蕴素 (280)
建国以来北京市建设资金的基本情况和历史经验
教训 高芳 黄河 (287)

社会主义税收是国家 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

- 新的历史条件下北京市财税工作新课题 魏树德 (299)
谈谈税收的调节作用 罗永和 (307)
利改税工作中的十个问题 张富珍 (315)
社会主义税收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王诚尧 (323)
利改税是加快城市经济改革的前提 王志良 (353)
端正思想，积极进行改革 于连国 (360)
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税负问题 韩英杰 (366)
开征建筑税中的几个政策性问题 张富珍 (371)
实施利改税有利于国营企业 宋汝征 (377)

经济杠杆在经济体制 改革中的有效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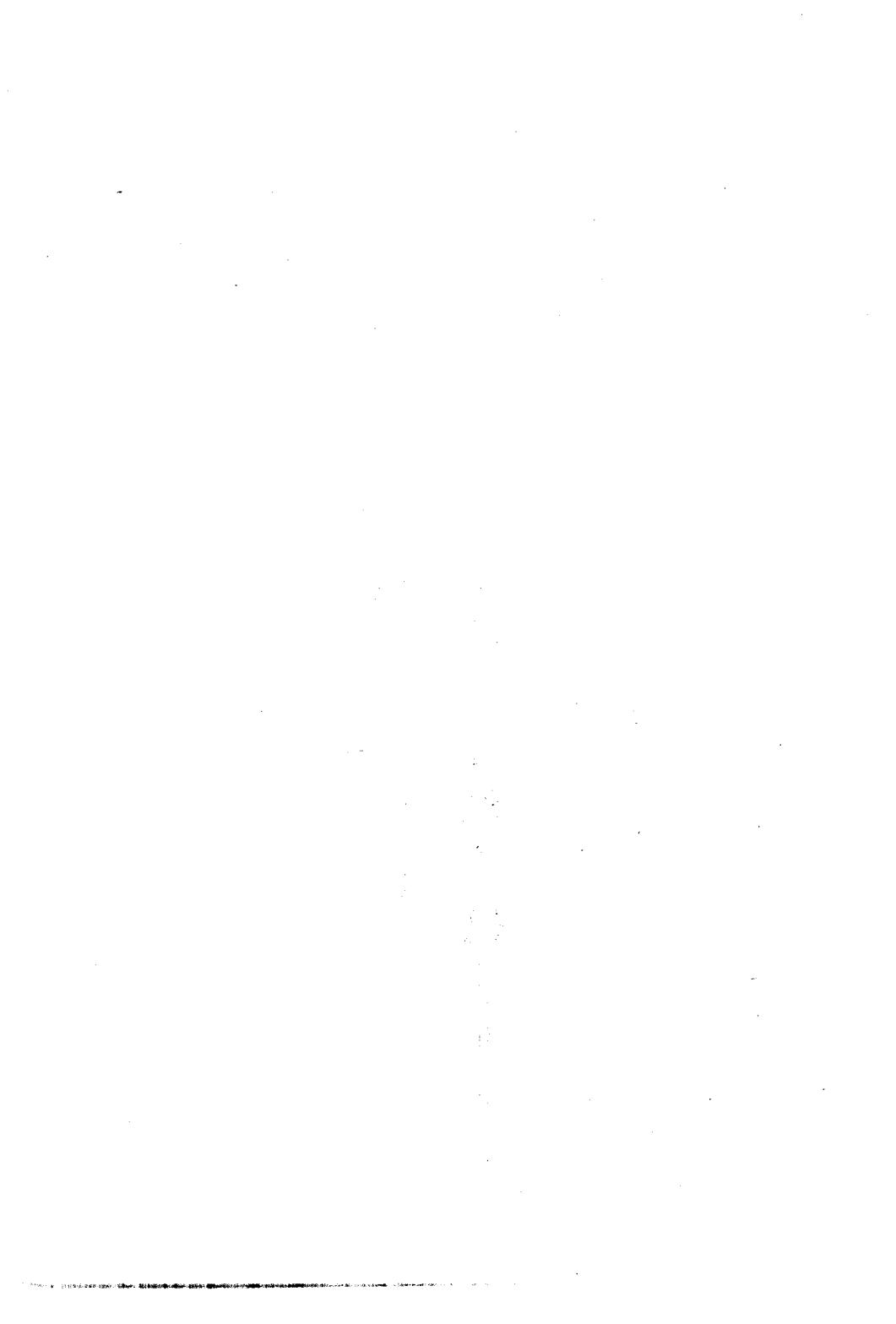
- 经济杠杆的机制及其发挥作用的条件 徐维梁 (385)
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陈征刚 黄文贵 (392)
试论企业财务工作中的“三财”之道
北京市建设资金战略和经济法制 张振铭 (404)
北京市地方国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占用情况的调查
..... 金汉玉 王建新 陈燕华 (411)
小型商业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效果显著 朱敏珍 (418)
北京市光辉百货商店承包三年的调查

外情介绍

- 东欧六国中央财政在财政体制中的地位 董霞飞 (427)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建设

中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认真贯彻党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许 穆

当前党中央决定要继续调整，但在调整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尤其是对目前经济形势，还存在一些糊涂看法。今天想就这个问题讲一讲：认清形势、统一认识，从而使中央的调整方针能够得到有力的贯彻。

经济的调整，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关系到各个部门、地区，以至于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也为全体人民所关心。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就提出来了。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因为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致使调整工作耽误了2年。经过2年来的实践证明，由于许多人对国民经济经过十年浩劫已经达到崩溃的边缘认识不足，加上左倾思想的危害，虽然三中全会后，提出了一系列纠正左倾的方针政策，但由于认识不一致，以致执行不力，甚至还有抵制。这就使国民经济继续处于失调之中，这种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如果不认识，不加调整，就会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这就是潜伏着的危险。

1980年12月国务院召开的省长会议和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了经济形势，并清算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进一步明确了调整仍然是关键，调整是实现进一步安定团结的物质基础。这次会议作出这样重要的决策，正是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贯彻。^②弄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左倾错误思想的清算，把经济工作的路线端正了过来，这是我们20年来的第一次。陈云同志说，“这

• 这是作者1981年1月28日在北京财政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次调整是健康的调整，是清醒的调整”，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这次调整，是处于完全清醒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因为领导上的认识一致、清醒、深刻，所以这次调整是处于自觉的状态，是健康的，这同60年代的调整有很大的不同。60年代虽然也认识到失调，但是没有清算左倾思想。而这一次，领导层总结了30年来的历史教训，清算 了我们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这一个变化是非同小可的变化，是不容忽视的。这是起决定作用的。因此我们在这一基础上才能有信心，有完全的信心，完全可以期望，在这个转变以后，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够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

此外，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央领导认识一致了，措施有力了，但还不能够说中央以下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认识一致了、都认识深刻了，也不能说我们的调整方针就没有任何障碍，能够得到贯彻了。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对：“现在真正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够多，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要看到这种困难。”这一事实经过工作会议以后，几个月来，我们也可以看到，的确没有能够完全被人们所接受，也没有完全被人们所理解，所以在贯彻执行中是有问题、有障碍的。如最近有一个省的市，上面下达了指标，压了基建，下了狠心，省常委开了扩大会议布置下去，执行了，下面又怎样执行的呢？砍了13个基建项目，6500万元，但又改头换面变用为社队办、或者是工农商联合企业，这样摇身一变，13个项目，6500万元没有砍下来。这就是没有深刻认识的证明，如果认识到了，就不会这么办。而且办的是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盲目增加纱锭。棉纺在全国已有1660万锭，还吃不饱，原棉还差10亿公斤，近一年多又建了355万锭，这样，我们的原棉缺口就更大了。我们现在已经向国际市场买了不少原棉和化纤。如要扩大进口，就会刺激国际市场涨价，生产出来即使增加出口，也是要亏本的。

又如对发国库券和向地方财政借款的问题，大家也不完全理

解。我们国家之所以要发国库券和向地方财政借款，是因为基本建设的规模过大，超过了国力的可能而采取的一种紧缩基建投资的措施。大家都知道，我们现行的财政体制是分级管理的体制，企业是实行利润留成制度，没实行利润留成制度的是采取了企业基金制度。因而国家虽然压缩了基建支出，但收入仍归地方和企业，如果不把这笔压缩支出的资金集中起来，那么，国家财政的收支仍然是不能平衡的，现在有些人对这样的措施想不通，说你刚刚放了权就又收回去了，或者说你又搞死了。这些认识就反映了一个局部和全局的矛盾。他们没有认识到宏观的国民经济在失调、失平的条件下，微观经济也是没有办法活起来的。这是由于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危险缺乏认识的反映，同时也是长期以来的左倾思想的一种反映。他们之所以对借钱想不通，还是想多留点钱搞基建，这就是障碍。还有的人认为，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基建投资一砍，下了马，设备就不定货了，生产就下来了，财政收入就没有了，科研、行政、文教经费又不能减少，还要发展，这样结果开支少不了，基建上不去，生产上不来，那末国民经济还是无出路。这种思想对不对呢？这当然是不对的。这些认识，就说明对调整的积极意义缺乏认识。我们认为对经济形势要有真正清醒的认识，就要进行具体分析，弄清形势好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什么地方？困难是什么？是不是现在困难已经克服了？我们说还没有，所以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必须弄清楚。弄清楚经济形势是非常重要的，对好的和困难的两方面都要认识清楚，否则也会犯错误，把好的和困难的都弄清，大家的认识才会一致，才能使我们的调整的措施得到彻底贯彻，从而保证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我们认为看到困难而悲观是错误的，反之，认为现在中央采取了调整措施，下了决心，就感到很乐观了，这也是不对的。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运用二点论；把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都弄清楚，才能正确贯彻八字方针，发扬优势，克服劣势，避免再折腾。

中央已经指出了，我们的经济形势是大好的经济形势。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着潜伏的危险，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把好与坏看成是完全对立的。就大部分同志来说，主要是对当前形势认识不具体，对国家困难也不那么清楚。

首先，为什么大家感觉不到有问题，大家都说，企业没问题，地区没问题，部门没问题，银行也感到没有问题，唯独中央财政部有问题，我想介绍几种情况来说明。

1. 从企业看，60年代企业，都处于困境，工资都开不出。而现在的企业，从1979年起，我们贯彻了八字方针，既抓了调整，又抓了改革，实行了企业扩权，改革了财务体制，调整权责关系，调整了分配关系，1979年第4季度开始试点，给部分企业扩大了财权，从中央财政分出去45亿元，1980年又扩大了试点，户数虽然只有6000多户，但是占了工交企业利润总额的60%多，多分出去60多亿元（企业原有专用基金不算在内）。再加上企业自留折旧基金（这是从1967年开始改革的），给企业180亿元（过去仅100多亿），这二项企业共增加资金230亿元。所以现在企业的日子比过去好过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的形势是好的。

2. 从地方看，1980年实行了分灶吃饭的体制，给各省市、民族地区、经济特区、老根据地、后进地区分别不同情况，在分灶吃饭的时候，给了一部分机动财力和补助。仅1980年一年就给了20多亿。所以这些地方的财政情况也比过去好。

3. 中央各部门和各个地区的部门，这几年来允许向国外出借，因此出国的借钱的多了，搞补偿贸易，搞合营，搞加工，都可以。另外，银行还可贷款，现在银行有中行建农（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这四大银行都贷款，所以从部门来看境况也是好的。

4. 银行这几年来境况显然好转，储蓄存款年年大幅度的增

长，1979年城乡人民储蓄存款46亿，1980年103亿，二年累计200亿元，此外，机关、企业、部队、建设单位的存款达上百亿，二三百亿的存款，这种情况是建国以来少有的。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了各个方面都有好转的形势，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日子好过了。你说潜伏的危险，甚至说危机四伏，这是耸人听闻、夸大其词。究竟国民经济形势好不好呢？下面作些分析。我们说经济形势好有以下几点：

1. 首先是农业经济形势大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了两个农业的政策文件，纠正了长期以来农村中存在的左倾路线，纠正了高指标、高征购，这是最最重要的一条，如果不纠正，你用什么办法去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力，增加的粮食都拿走的话，农民怎么会有积极性。高征购、高指标，农民吃不饱肚子，这是一个教训。这几年我们一年进口100亿公斤粮食，高征购、高指标削减以后，向农民少购了，农民手里有了粮，才有肉禽蛋，才有养猪的可能性。在三年困难时，那时农贸市场肉卖2元多一斤，4元多一斤还是发展不了肉禽蛋。所以要有粮，农民才养猪养鸡养鸭，去年猪肉供应充分，不仅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主要的是100亿公斤粮，纠正了脱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这是基础，实行了联产计酬包产到户，这是政策的威力。第二是纠正了瞎指挥，第三是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100亿元，预算80亿元，减免税20亿元，农民得到好处，因而1979年获得有史以来的大丰收，农林牧副渔有了很大的发展。肉禽蛋上市量大大超过了预想的指标，甚至吃不了，降价销售，不但城市降价，而且农民吃肉，我们还出钱补贴，农民自己养了猪，自宰自吃一斤补贴0.25元，请你吃爱国肉。农贸市场开放以后，经济活跃，价格虽然略高，但是还平稳，不象三年困难时期。现在价格不高，供应充足，甚至南涝北旱十分严重的1980年，还夺取了建国以来第二个高产年，每人平均比上年增加收入9.60元。陈云同志说10亿人口，8亿农民得到了安居乐业，六畜兴旺，这是什么形势，这是大好形势。陈云同志要我

们认识国情，这就是国情，这也是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八亿农民得到安定这是我国国民经济稳定的基础。

2. 城市职工生活这几年有了改善，就业人数增加，1979年增加900万，1980年增加800万，今年还要增加600—700万人，明年、后年还要增加。这和60年代不同，那时2000万人动员回乡。我们中国人是不允许失业的，社会主义是劳动者得食，不劳动者不得食。能劳动的都得给他安排，现在不是有人说吃大锅饭就是因为人太多了，批评我们包下来的政策，我认为这个批评不对。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考虑就业问题，决不能采取不管的政策。“文革”时期，上山下乡有几千万人，多少人有意见，子女上山下乡，不能就业，现在又怎么能再让农民来养我们的子女？我们必须从宏观经济上来认识人口问题。另外国营企业职工5000万人，1977年低工资调资面是40%，1978年调资面是2%又加了一点，1980年又调了40%。这两年来又发了奖金，1979年是40—50亿元，1980年是80—90亿元，实际上100亿还要出点头。发了这么多奖金就是形势好的证明。虽然农产品提了价，但每人补助了5元。现在人们有意见的主要问题是议价和变相涨价，这样没有奖金的职工吃了亏。但1980年年底，文教、行政机关干部也发了奖金，每人大体上是50—60元，这样全国职工实际的收入都增加了。

3. 市场供应有不少改善。这两年来，由于农业好、轻纺工业增长快，市场供应不仅在质量上或花色品种上都比过去好而多。每年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1%—12%以上（扣除了价格因素）。这是建国以来少有的，也是与60年代完全不同的，60年代市场购买力是下降的，零售额也是下降的，说明现在的市场的形势是好的。

4. 外贸进出口1980年比1979年增加。60年代是封锁的，不跟苏修作买卖，现在是五湖四海皆朋友，国际贸易发展了。

5. 住宅建设是有史以来最多的。60年代认识到这个问题，

但没有力量解决，1979年建成住宅6000万平方米，1980年建成7000—8000万平方米，一年要完成7000万平方米的住宅建筑得花100多亿投资。在国家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这么多投资搞住宅这证明是大好形势。现在虽然有人有意见，因每人还住着平均二点几平米，三代同堂，困难不困难？困难。但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抓住住宅建设，每年建六七千多平方米，已经不算少了。所以形势是好的。

6. 文教、卫生、科研事业，每年增加投资10多亿到20亿，现在20亿左右，大家还不满足，这是对的，但应该说增长的速度还是快的。这在60年代是无力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说人民生活这几个方面，国家每年增加开支不能再说少了。这证明我们的经济形势大好，这是区别于60年代的根本之点，也是我们好的起点。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要回答的问题：你说形势样样都好，另一方面又说有潜伏的危险，那不是自相矛盾吗？这问题提得很好，应把这问题弄清楚，才能统一认识，才能切实地贯彻调整的方针，才能对八字方针取得统一的认识，把工作做好。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同心同德向前看，使国民经济健康的发展，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怎样来认识困难？潜伏的危险在那里？

1. 上面说过了，从企业、部门、地区、银行、市场等方面，都感到形势是好的，都没有感到有困难。农业、轻工、外贸也是蒸蒸日上之势，困难在那里呢？有什么危险呢？

我们知道，国民经济在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已经处在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而且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本来在这种形势下应该立即着手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左倾思想极深，当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振奋精神来挽回被“四人帮”破坏的经济时，大家积极性很高，生产恢复较快，财政收入增长也快，这时生产还没有来得及恢复计划管理制度，当时生产还是处于无政府或半计划的状态，计划是不合比例的，虽然生产增长较快，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一定符合生

产、生活、建设的需要。因此虽然增产增收了，但却是相当多的产品积压着，如钢材库存达到2000万吨，机电产品积压640多亿元（历年积压）。但在财政上却把它作为实现的利润和税收，收上来了。然而拿这些收入去分配，用之于搞基建，用之于改善人民生活，显然是不能实现的。但是人们却看不到、认识不到，可是现在暴露了。也有人说，这是财政的虚假。“虚假”这两个字值得商榷，我认为这主要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所以这种生产是不能实现的。列宁曾讲过实现论，这就是我们生产的产品没能实现。现在有人说，你财政虚假，财政收入应以最终产品来实现，同志们，按最终产品来实现，要你买到猪肉吃到肚子里，才能实现利润，那怎么分配？分配是在消费之后分配还是在生产之后消费之前分配？马克思说分配和交换是生产与消费的中介。生产了只有通过分配，才能再行交换，才能实现消费，没有分配就不能交换，有了交换才能达到消费，所以现在有的人研究实现论，一定要按最终产品的最终实现。这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提出来，大家研究。

现在反映库存大，生产建设用不上，财政出赤字，这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为什么？这是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形成的错误的经济结构造成的。错误的指导思想支配了分配结构的错误，分配在投资方向上的错误造成了畸形经济结构，使产业部门的比例失调。我们历史上曾有三次比例失调：大跃进时花了1000亿，搞了以钢为纲，1000亿没有经济效果。第一个五年计划花了550亿多，每百元投资创造33—35元的国民收入。调整时期花了400多亿，这时每百元创造国民收入57元，到了搞三线建设还是以重工业为纲，花了1900亿元，每百元国民收入仅为8元。这是第二次经济结构的错误。两次经济结构的错误加上“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恶果，生产不配套，以钢为纲，只追求粗钢产量，不讲钢材品种，不讲比例，不讲计划，不讲平衡，这样的经济结构带来了严